

为实现灾害损失的最小化而努力

——评《灾害经济学》*

李沛诚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我国地域辽阔,灾害频发,中华民族就是同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灾害作斗争中生聚、成长和繁衍起来的。从本质上看,灾害意味着可以计量的经济损失,即各种自然资源的被破坏,各种社会财富的被毁灭,人员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和生活的失常,以及人们精神的损害。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灾害仍然是不可绝对避免的客观事实。因此,如何做到灾前预防、灾时控制、灾后救援,以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条件,尽量实现灾害损失的最小化,以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始终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针对中国现实的灾害频发的状况,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于80年代初就首先倡议建立和发展一门新的经济学科——灾害经济学。他指出: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如何减少不可抵抗的灾害给社会经济效益带来的破坏和损害,如何在灾害发生的损害已经造成之后,努力去谋取有所补偿。这就是说,灾害经济学研究的是‘负’的经济效益。”可以肯定,灾害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将不仅能够科学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出各种灾害发生与发展的规律,阐明灾害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可以提供防范与控制灾害的经济方法和手段,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研究氛围中,武汉大学郑功成教授的《灾害经济学》应时而生,于1998年9月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灾害经济学专著。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灾害问题的实质即是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应当且只能是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即灾害发展的规律涉及经济的方面)是消极的,但它追求的目标(即灾害损失的最小化)和所起的作用却是积极的。它能够指导人们认识和掌握灾害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防

止、避免或减轻灾害的损失,同时它又能指导各种具体的减灾活动,避免灾害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化。《灾害经济学》的社会价值也就在这里。

为了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灾害经济学》以8章25万余字的篇幅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第一章“绪论”开宗明义讲灾害经济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对象和方法,强调灾害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损失,灾害问题的实质即是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第二章论述灾害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从宏观来看,灾害的不可避免规律、不断发展规律、人灾互制规律、区域组合规律。第三章论述灾害经济学包含的五条基本原理,即周期发展原理、害利互变原理、连锁反应原理、负负得正原理和标本兼治原理。第四、五章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考察了灾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既包括灾害对农业、工业、其它产业及国家财政的影响,同时也包括了灾害对企业经济、家庭经济和社会公共组织等微观经济的消极作用。第六章论述灾害损失与经济补偿。有灾害必然有经济损失,有经济损失必然需要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事先建立的经济补偿机制,实现对各种灾害风险的分散、转嫁和保险,对灾害损失进行不同的经济补偿,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人民生活条件不致陷入困境。第七章论述减灾活动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主要指防灾、抗灾、救援的措施和活动的经济价值,强调减灾投入的适量与减灾决策的正确具有重要意义。第八章论述减灾问题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是“寻求灾害损失最小化”研究主题的总结,并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灾害经济学》有缜密的论述、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回顾,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字里行间蕴涵着一个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作者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印证。他说:“本

* 郑功成:《灾害经济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书既是对(光远)老倡议的一种积极响应,也是对我以往研究灾害经济问题的一种理论总结和概括。它研究的内容是灾害事故的经济起因、经济损失和经济投入及其成果,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消极的灾害问题,并寻求积极减损方法和途径,研究的目的在于维护既有的社会财富或物质利益,追求损失的最小化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作者长期从事灾害经济研究,本书从动笔到完稿也经历了4年多时间,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作者的专业研究在时间上不仅面对现实的灾情,而且向历史与未来延伸,在空间上则很自然地从中国向全球范围扩展。由于视角广阔,指导思想明确,作者又勤奋努力,使《灾害经济学》的写作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使读者获得了清醒的灾害意识。例如,我国1959—1961年的全国性大旱,粮食严重减产,招致非正常化死亡2000万人以上,使第二个五年计划被迫推迟三年才得以实施。1976年唐山大地震,使一座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一片废墟,死伤40余万人。1991年江淮大水灾,使江苏安徽两省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此后两年才基本恢复元气。1995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由于工业的相对集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们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明确、清晰的反映,人们读后一定会感奋起来,投身于防灾、抗灾的活动之中,争取灾害损失的最小化,进而变灾为利。

第二,对灾害损失有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启迪人们从宏观上把握灾害的危害程度。例如,1959—1961年的连年大旱,导致了亿万国民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书中列表显示了这四年中春荒的总人口数、患营养性疾病的人数、卖送儿女人数、非正常死亡人数,使读者对这场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一目了然。全书有47个图和表,平均每章有将近6个图表,对灾害的严重后果和防灾、抗害的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这样就使作者的观点建立在可信的科学基础之上。为了论证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人为灾害的重要性,作者以车祸为例,指出:1991年我国共发生车祸26.5万起,造成4.9万人死亡和15.6万人受伤。1996年车祸上升到28.8万起,死亡7.4万人,受伤17.4万人。1997年车祸高达30万起,死亡达7.4万人,伤19万多人。这些警醒人的数字表明,人为灾害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要大大超过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危害程度也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面对如此严重的人为灾害,人类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防救结合,防重于救,使灾害损失减低到最小。

第三,对现实的减灾、防灾的措施,有比较公正、客观的估量。以中国北部的沙漠化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内蒙古曾经被沙漠化的土地达3100万公顷,潜在沙漠化的土地

达490万公顷,全地区还有1730多万公顷山地和1400多万公顷丘陵地被水土流失冲刷得沟壑纵横,土地的被毁坏,严重地困扰着全区经济的发展。1978年,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到1995年二期工程结束,内蒙古的沙漠化没有扩大,反而增添了460万公顷绿地,部分地区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对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作者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同样是一项造福后世的减灾工程”;三峡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地扼制长江中下游的水患,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不正确选择,例如大范围内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以及在气候不宜的山区强行推广“双季稻”等,作者敢于进行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时至今日,许多地区还在为当年的失当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他认为研究灾害经济学,选择实现灾害损失最小化的正确途径、措施和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强调在防灾、抗灾和救灾过程中,始终要突出人的因素。例如,作者把减灾方式划分为工程减灾和非工程减灾两大类。工程减灾如水利工程、防震工程、防风固沙工程、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土地盐碱比、人工降雨、防霜防冻、消防工程等,都是工程减灾。这些工程都要人去做,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取得实际效果。非工程减灾,则是以大众为服务对象,以各种传媒为传导机制,以技术信息服务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进行减灾宣传、训练等,这就更加要重视人的因素,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减灾运动,就是人类有意推动的结果。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的抗洪斗争,培育出一种伟大的抗洪精神。在《灾害经济学》第七章中,作者讲一个共工防洪和鲧障治水、大禹导滞的故事。共工生活的年代,黄河水患是主要灾害,为了抵御洪水,共工用“壅防百川,堕高埋卑”的办法来治水,即在河岸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堰,以抵挡洪水的漫延,保护堤内的居民和耕地。到了尧的时代,鲧障治洪水却墨守成规,仍用共工“围堵”的办法。由于当时人口繁殖、耕地扩展,村落众多,鲧治水九年无成,最后殁死于羽山下。鲧的儿子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采用疏川导滞的办法,结果获得成功,并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颂。这说明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及不同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选择哪种防灾、减灾手段为宜,关键仍然是人的因素,古代人如此,现代人更是如此。不充分注意这一点,就实现不了灾害损失最小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410006)

(责任编辑:金萍)